



中日网

——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

当前位置: 首页 > 研究专题 > 南京大屠杀 > 论文

明报周刊：罪与罚的代价

发布时间: 2007-12-26 点击次数: 653 作者: 田川

南京1937—2007

——楔子

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之时，10万中国军队拥挤在南京下关码头争相逃命，长江中却无船可渡，站在两岸的日本人像打靶一样，把子弹嵌入中国人的身体里。每当我想象起那场景，都掩不住泪水，那种痛！那种屈辱！

我曾在心中非常怀疑自己，那是一个如此“遥远”的年代，与出生于70年代的我有何相干？

2004年12月4日，南京大屠杀活着的人证李秀英在南京鼓楼医院辞世，在此前，我正带着一支纪录片小组拍摄她。我还记得李秀英辞世前，从紧闭的眼中流出的那一滴泪水。我们走出鼓楼医院，在南京的街头举着摄像机，像疯子一样问所有遇到的路人——老人、孩子、学生、职员：“你认识李秀英吗？”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在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。镜头背后是我们的眼泪。那眼泪不是因为屈辱，是因为感受到悲壮而激动！

李秀英如此坚强，1993年一位台湾记者问她：“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？”李秀英回答：“我又不是会计！”

每当那个纪念日来临，我们都会听到南京上空的警报声，然后我们的头脑中就会反射出一个数字和一个词，“30万”和“暴行”。70年前的那场浩劫难道只给了我们这点东西吗？好像我们只要像会计一样准确地记住这个数字就行了。

每当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被迫在媒体面前撕开自己的伤痛，一遍一遍诉说他们遭受的耻辱时，我都在想，到哪一天算个终结？

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把李秀英们当成过人，他们是工具。谁关心过战后的每一天他们是怎么过来的？关心过他们的伤口又一次被媒体撕开后整夜整夜的难眠？我们在日军伤害了他们之后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是否又一次次地漠视着、伤害着他们！

当欧洲各国在战后形成共同反思、达成谅解、走向未来时，我们东亚各国还在为澄清历史互相指责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还在不停地利用受害者，去谋取政治上的权宜之利。一次次，民间的裂痕在加深，苦痛被继承。

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李秀英们仍会带着泪走向永恒的故乡，无数出生于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后的我，仍会一想起那“毫不相干”的战争，便流下屈辱的泪。

2007年11月25日，日本人渡边夫妇在南京上演了他们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话剧《地狱的12月》，他们以此作为支点对折磨了他们半生的“罪与罚”进行解脱。他们不像很多日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用一句“那是上一代的事情”来轻飘飘地获得心安理得。

一个普通的南京市民——吴先斌先生，他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，办着一个小小的抗战博物馆。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他也需要解脱。解脱那模糊的历史给内心带来的伤痛。

战争的痛不仅属于受害国的国民，也属于加害国的国民。在纪念南京大屠杀70年的时刻，我们需要一个支点，直面历史，走向未来。

今天我们讲的故事中没有揭露、谴责，在浩劫已经过去了70年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应该用勇气、信念、泪水、感动与宽容去获得那些冥冥之中亡灵的微笑？

罪与罚

横井量子出生在日本东京目黑区的一座三层的旧建筑里，在有着旧江户时代风韵的旧板屋里，她上完小学、中学，童少年宁静而温馨，她的父亲是一位勤恳的商人，一家的生活富裕安宁。29岁那年，横井量子嫁给了一个叫渡边义治的人，从那时起，噩梦开始了。丈夫经常在梦中呼喊、惊醒。她说：“我发现他害怕拥有幸福，幸福快到手时，他就想把它扔掉。久而久之我也会和他走入黑暗中。”

横井量子认为自己根本不了解丈夫的过去，进入不了他的内心。中年以后，丈夫经常独自去中国旅行，满腹狐疑的横井量子开始追问渡边义治的过去。

“我父亲1934年自愿当兵去了中国满州，虽然我没问过父亲到底杀害了多少中国人，但是他当时是‘维持治安’的，专门逮捕反满分子，毫无疑问他亲手杀害了很多中国人。”渡边记得小时候，父亲经常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日本刀把玩：“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光泽和杀气，我们就睡在杀过人的军刀旁边。”

渡边的父亲经常会在半夜三更突然惊醒，战争中受害者的面容和当时的情景似乎又在梦中重现了。“在20岁以前，我被灌输的就是只要努力勇敢，未来一定光明，但在我心里，总有一种不能填平的不安与恐惧。”

渡边义治出生于1947年，正是在这一年，他的父亲作为C级战犯而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。邻居因此而躲着他们一家；渡边的父亲经常在家中施暴，殴打妻子。

“家里强烈的紧张与不自然的沉默所支配的那些日子，造就了我，这些心理与站在战场上的日本兵是相同的，活在一个失去‘原则’与‘大义’的生活里，我与家族在战后还生活在那个战场上。”

渡边的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也上吊自杀。

横井量子突然觉得丈夫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，既陌生又恐惧。关于战争，她只知道东京大空袭，广岛和长崎的原爆。在东京隅田川宁静的河边，这样的怪谈是从小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横井量子所不能理解的。当渡边小心翼翼地问起横井的家庭时，横井愤愤地说：“请不要把我与你的家庭相提并论。”

横井量子问家人，自己的父亲战争期间是否也去中国打过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横井的父亲因为平足，被免除了兵役，因此留在东京目黑区经营着小书店。随着战争的深入，书店的经营范围扩大到经营附近辎重部队的日用杂货。

横井量子记得父亲的照片中，有一张让她不太舒服，那是父亲和好友及一些艺妓们的合影，父亲张着大嘴大笑：“我从来没见过父亲那样的笑，‘赚了大钱’的那种笑。”

但父亲没有去打过仗的事实让横井感觉舒服了一些，自己的一切至少是干净的。

渡边义治完成了电子的学位后，在一家公司负责销售，工作之余，他仍然不停地去中国旅行。在百货商店上班的横井明白，丈夫的目的是要去探究自己的父亲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。渡边义治在中国东北寻找那些遗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，听他们谈战争期间的遭遇和战后的生活；他去参观日军“七三一细菌部队”的暴行；收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。

横井说，当丈夫家族的战争加害罪变成了对自己的“威胁”时，“我选择了自我防卫，本能地选择了藐视自己的丈夫。”

1990年，渡边突然有了创作一部话剧的想法，他想讲述那些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如何被中国人收养，战后回到日本的故事。他把这部戏起名叫“重逢”。

渡边向曾经业余学习过戏剧的妻子寻求帮助，横井意识到，这也许是让丈夫放弃“自责”的最好办法。

1991年，妻子横井量子第一次和丈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，为话剧收集素材。当他们参观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时，横井突然发现，照片下方印着的一行说明——“摄影：村濑守保，目黑辎重联队”；横井张大了惊讶的嘴。她突然明白了，自己父亲为什么可以张开大嘴大笑，父亲靠什么“赚了大钱”，父亲常说的“趁着时代的浪潮去捞一笔”是什么意思。她更知道了自己童年最喜欢的黄色裙子是用什么换来的。

“那是比直接参战更肮脏的人生，我们是靠牺牲他人来发财生活的！”横井量子将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哭了三天。

在上海四行仓库参观时，这对夫妇泪流满面，长跪在谢晋元将军的铜像前忏悔谢罪。

横井决定在丈夫的话剧中出演日本遗孤的角色。上台之前，横井非常紧张，腿都在抖，但是上台后，她从观众席上感受到了一股暖流，当演出结束时，观众集体起立鼓掌，横井和丈夫渡边突然稍稍感到了一种解脱。

话剧《重逢》于1993年开始在日本全国内上演，共演出280多场次，有12万多人次观看。1995年，适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《重逢》剧组来到中国，在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北京等地上演。2001年，远赴美国三藩、圣他克拉、洛杉矶、纽约等城市。

2007年10月30日，我在南京见到了渡边和横井，他们正在为即将于11月25日在南京上演的新戏《地狱的12月》做准备。当天上午，他们夫妇去参观了南京下关码头。横井女士说，下关码头有一个纪念碑，上面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文字，他们想去看看。走到那里时，正有一对年轻的中国情侣站在那里看碑文。情侣侧目看了一眼渡边夫妇和翻译，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后，那个女孩子迅速让开了位置，躲得很远，好像很嫌弃他们的样子，横井走近纪念碑，看完碑文后，走向女孩，鞠躬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“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位女孩子脸上突然绽放出的笑容，仿佛刚出生的婴儿，好像所有的恩怨在那一笑的瞬间都消失了。”横井说到这里哭了起来。

《地狱的12月》是一部关于“罪与罚”的戏剧。全剧分两幕十一章，两位主创人员的生活体验交织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。横井在剧中既扮演自己又扮演众多的大屠杀证人，其中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女士和李秀英女士。在演出前，我曾告诉她，我是李秀英去世时最后的见证者。2004年12月4日，我正带着一个剧组在南京拍摄纪录片。李秀英去世时，闭着的眼里流下了一滴泪。横井又哭了。

继《重逢》后，《地狱的12月》自2007年开始，已在日本各地上演了30场。排练、演出所有的资金都是夫妇两人自己筹措，日本市民团体赞助的。我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换成自己，我能否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去做这样的事？我做不到。但我想，这样的比较是不合适的，因为我永远无法体会那种痛苦在心里的重量。

渡边夫妇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和辱骂的邮件，日本一些团体甚至传真给教育委员，指控他们夫妇是中国间谍，拿中国政府的钱来羞辱日本，要求不要租借场地供话剧公演。渡边义治说：“一点也不会感到恐惧，我有责任做这些。”

2007年11月25日下午1点55分，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小剧场的后台又一次见到了渡边夫妇，在类似走道的窄小的化妆间，渡边双手垂放，紧闭双目。

还有5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。

此时是战后62年，自1937年算起，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。这些数字像枷锁一样捆绑着我们。

在观众席的第一排，坐着大屠杀的幸存者及他们的后代，夏淑琴女士、李秀英女士的女儿和儿子-----

儿时的不安与恐惧；成年后的沉默与彷徨；妻子对丈夫的不解，对丈夫自责的宽容，对罪的感同身受。这部真实的戏剧在多少个角落里存在呢？

在我眼前是两位如此有勇气的人。我记起，过去每当听到日本人的忏悔，国人内心都会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：“他们活该，他们罪有应得！”这些国人中，也曾经包括我自己吧。这样的逃避如此容易、如此轻松。这样我们就不要像我眼前的这两个人一样，去为那“不相干”的陈年旧事救赎、解脱？

渡边夫妇说：“日本人再有钱，也不会幸福，只要中国人和亚洲人的怨恨存在一天。现在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，那只是幻想而已。”

战后有多少人还在为这“罪与罚”付出代价？不仅包括受害国的国民、加害国的国民，还有很多人！

1941年5月14日，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拯救中国难民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，在美国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年仅55岁。

1950年，《拉贝日记》作者德国人拉贝先生心情忧郁，在柏林患中风去世。

2004年11月9日，《南京暴行--被遗忘的大屠杀》作者张纯如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，然后掏出手枪，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。

演出的铃声响起了，渡边夫妇起身走向舞台。我愿意把这铃声当成钟声，钟声为谁而鸣。为你、为我、为他！

2007年11月25日下午4点55分，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小剧场的舞台上，看到横井女士长跪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女士面前，夏淑琴女士将她扶起，两个勇敢的女性相拥而泣-----

版权所有：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
2004年12月13日创建